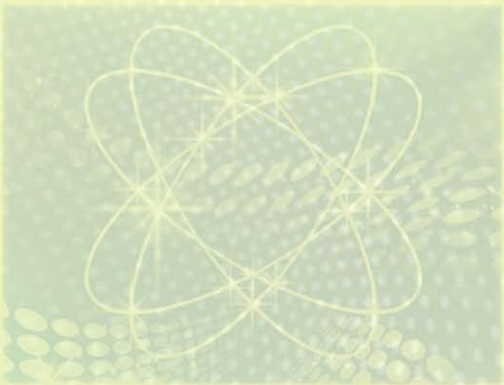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



前　言

本书选择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读博期间，导师授课时提到空间理论目前少人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学界它已经是一个热点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因为国别、翻译的问题，在国内没有形成关注点。导师的一番话，激励我写出了《空间与权力——福柯空间观解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论空间叙事的兴起》(《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两篇论文。于我而言，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研究的缘起。第二，工作以后，教学任务繁重，每天奔波于宿舍与教室，有时还需要上中国知网补充和拓展教学内容，发现空间问题仍有研究空间，有待热心人去挖掘、整理和探索，基于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算是不成熟的前期成果，于是我不揣浅陋，申报了天津市的项目，但屡战屡败，无果而终。这更促使我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空间知识的积累。第三，此后，我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2010年，申报了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如愿获批。获批之后，一方面是教学工作繁忙，科研工作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懈怠和懒惰，总觉得可以喘口气，稍作歇息，却不知光阴倏忽而逝。结项日期逼近，才临阵磨枪，查阅、检索、研读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空间问题俨然已成“显学”，错失了紧追学术前沿的良机，未能发人之未发，见人之未见，遗

憾与自责时时伴随。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集中梳理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已有成果、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学者众多，立场鲜明，观点各异，对国外的空间理论研究做了初步概括。国内空间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国内学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的研究、阐释。此外对选题意义和研究内容做了初步说明。

第二章主要关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政治内涵，共分为四个小节：空间与文学叙事、空间与权力政治、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认知图绘与文化政治美学。空间与文学叙事一节，认为空间维度在19世纪之前遭到了忽视和贬损，同样，小说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但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新叙事学都强调叙事在时间序列中的建构，一直以来忽视了叙事的空间维度以及叙事中空间的地位、影响和作用。空间与权力政治一节，主要讨论福柯的空间理论建构，从“空间的着魔”(Spatial Obsessions)、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和圆形监狱：空间与权力的极致范例(Par Excellence)三个层面分析福柯的权力政治哲学，福柯揭示了空间、知识、权力三者微妙而复杂的内在关联。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一节，从索亚三种空间的划分、第三空间的理论来源、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第三空间的理论意义四个层面深入讨论第三空间，提出第三空间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批判策略，最终目的是试图恢复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的平衡。认知图绘与文化政治美学一节，从资本主义空间范畴的三个阶段、后现代状况下“超空间”特征及现状、“认知图绘”文化政治美学的提出三个方面，提出认知图绘是后现代社会政治规划必不可少的环节。詹姆逊通过认知图绘来规避后现代“超空间”所带来的世界难以表达的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幻

想、迷失和乌托邦精神枯竭，重新发挥空间的作用，达到其实现文化政治诗学的目的。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题域，共分为三个小节：空间与身体问题、空间与文化身份、空间与消费文化。空间与身体问题一节，主要从西方哲学史中身体观的发展概述、列斐伏尔的空间身体观、福柯的空间身体观和哈维的空间身体观，试图挖掘身体背后隐藏着的空间、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内在关联。空间与文化身份一节，从空间与文化身份的源起——爱德华·索亚的空间与文化身份的发展——霍米·巴巴的空间与文化身份的文本实践三个层面探讨，提出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对抗殖民主义的途径与方法并不是重构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反抗贯穿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渗透到混杂化的进程中去。空间与消费文化一节，从消费空间的形成、空间消费的特征、空间消费现状批判和空间消费现状反思四个角度，提出消费社会充满着诱惑与幻象，必然对主体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正是借助“消费”这把钥匙，空间与空间的想象之门向主体无限敞开。

第四章讨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共分为三节：空间生产与后大都市的空间建构、权力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表征、都市空间生产逻辑与空间异化。空间生产与后大都市的空间建构一节，主要从都市空间生产机制、后大都市空间与意识形态、后大都市空间与知识、后大都市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四个层面讨论了空间的生产、再生产与后大都市空间的重组与重构的关系。权力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表征一节，主要从权力的内涵、权力与空间生产、权力与文化表征三个方面，提出权力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力量，它通过与资本、科学知识共同操控空间生产。同时，在后大都市空间生产中，文化表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表征参与甚至促进了权力和资本对

都市空间的渗透。都市空间生产逻辑与空间异化一节，主要从都市空间生产逻辑、空间的异化两个方面深入分析，认为资本空间会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所建立全新的空间关系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解不符合资本要求的空间形式。从而，一方面改造了原有的空间形式，摧毁旧有的空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占有新的空间，并生产出全新的空间形式和空间生产关系。

第五章讨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历史启示，共分为两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的现实成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现实成果主要从国内城市空间问题的理论阐发与实践运用，城市空间问题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土地如何通过阶级和国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与管理的问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或城市理论，影响和启发了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理论资源解决中国城市空间问题和发展建设问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理论原创和实践运用不足、资本权力逻辑导致了城市空间问题的日益突出，呼吁“空间正义”，提出“空间生产”“时空压缩”“第三空间”等这些理论基点都在于追求“空间正义”，对“空间正义”的探索和追寻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大议题，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城市的基本路径。

另：因客观原因，我无法与本书引用的图片的原作者直接联系，见书后烦请有关作者与我联系。

著　者

2015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意义……（1）
第一节　研究现状……（1）
第二节　研究意义……（35）
第三节　研究内容……（36）
第二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政治内涵……（39）
第一节　空间与文学叙事……（39）
第二节　空间与权力政治……（54）
第三节　“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74）
第四节　“认知图绘”与文化政治美学……（87）
第三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题域……
……（101）
第一节　空间与身体问题……（101）
第二节　空间与文化身份……（117）
第三节　空间与消费社会……（130）
第四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贡献与不足……（146）
第一节　空间生产与后大都市的空间建构……（146）
第二节　权力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表征……（157）

第三节　都市空间生产逻辑与空间异化…… (168)
第五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历史启示…… (179)
第一节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的现实成果…… (179)
第二节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188)
附录：国内举办关于空间问题、空间理论、都市文化的研讨会情况…… (194)
参考文献…… (206)

第一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19世纪末，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构型、都市景观、都市消费、都市文化及都市问题等逐渐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域，空间问题开始进入社会理论和文艺研究范畴。本雅明较早从哲学的维度，反思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都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艺术批评置于空间维度尤其是都市空间之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索亚、哈维、卡斯特尔等人从空间问题出发，掀起了空间理论探索热潮，逐渐形成了不同学科的交叉、互溶与渗透，建构出文化地理学、空间政治学、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学科。空间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理论新贵，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第一节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新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理论奠基

当代国外的空间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法文本发表于1974年）与米歇尔·福柯发表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1967) 为空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理论基础，列斐伏尔指出："生产空间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与实际上是近期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他认为，对生产的分析使我们已经由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① 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空间中的生产并未消失，而是被引至不同的方向"②。空间生产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另一位奠基人物福柯，其著述繁丰，但他对后现代地理学中空间理论的建构却鲜为人知。他对于空间的论断引人深思：当下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一个同时性与并置性共存的时代，时间所发展出的世界经验远少于空间，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是，福柯通过深入调研和现实案例揭示了空间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社会空间理论

在他们的影响下，曼纽尔·卡斯特尔、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地理学、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社会空间理论。卡斯特尔发表的《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城市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空间是由一个特定的关系来界定的一种社会产品，而这种起到界定作用的特定关系，是

① 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3 期，第 14－20 页。

② Henri Lefebrve：㊀ State，Space，World，㊁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p. 185－195.

包含了各种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的混合。“空间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集合体和一种社会的形式，这种集合体或者形式通过他们所表达的社会过程来形成其意义。另外一方面，空间能够对其他社会关系形成特殊的影响，途径是通过他们构成的结构性示例形成的特殊形式”①。此外，空间亦可通过所构成的结构性示例形成的特殊形式深刻影响其他社会关系。欲理解空间的特征，需先从空间的结构特征入手。人们欲分析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间，亦应先将与之联系的范畴作特殊化处理，着眼于上述要素指向的基础形式。在此进程中，城市、空间、资本主义生产三者密不可分。“在社会实践中，城市和空间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效果，它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空间划界的社会特征，来自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有空间单位（units）就有再生产这种过程的单位，这种再生产是劳动力在一定日常空间的基础上确定的。城市单位生产过程——就像公司对生产过程一样是一种特定的单位——需要用其他单位进行说明，这些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过程。这样一种城市特殊性也是历史性的：它来自社会中经济性的具体的统治——生产空间是区域性空间，其再生产被称为城市空间”②。1973 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将城市与空间的问题纳入社会批判的理论框架，其随后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希望的空间》进一步将空间问题、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研究融合。哈维提出：“新的空间和空间关系不断被创造出来。全新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延伸的城市，高

① Castells M：《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1977，p. 430.

② Castells M：《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1977，p. 431.

度生产的农业景观被创造出来。”[①]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变得愈发有利可攫。空间生产演进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而言空间的生产，特殊来看城市化，变成了大买卖。这是吸收剩余资本的关键方式。所有全球劳动力重要部分用来进行建设和维护建设环境。大量的相关资本，通常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出现，被放进城市发展过程的流动中。这些债务推动的投资经常成为危机形成的震中”[②]。不仅如此，哈维大胆推定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空间修复”无法挽救陷入衰退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自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迈入后现代阶段之后，资本主义的“时空压缩”已使整个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空间修复”将越来越面临没有更多的可供“修复”的“空间”而日渐失灵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进行空间修复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需要一个成熟的、完善的金融体系，而私有化是剥夺性积累的利刃。剥夺性积累引起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斗争和大规模的反抗。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金融化浪潮最终自己终结了自己，因为大量所谓的金融资本，实际上只是由不切实际的会计核算和彻头彻尾的空资产所支撑的不可收回的虚拟资本。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特殊形态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③]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将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地理学研究融为一体，建立起社会批判的空间理论，恢复了后现代地理学中的马克思政治学批判传统。索

① 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 Ltd，2010，p. 143.

② 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 Ltd，2010，p. 166.

③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7 页。

亚推出了“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阐释当代空间问题的全新视角。索亚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即“历史、社会和空间是理解人的生活活动的三个维度，不能偏废，但是他认为社会空间辩证法不是环境决定论，它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创造了空间。他比较欣赏的是空间转向的重要表现就是空间资本和空间正义问题的形成并成为重要的讨论话题”①。索亚并没有止步于上述空间理论探索，而是不断地寻求空间正义，尤其是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他认为，“为了推进正义问题的思考需要将地理学与法律和法律批判研究结合起来，从这种法律和地理学的交叉哺育中形成了学界的另类思潮，即对正义、民主、市民、统治权和人权等从空间的角度进行重新思考”②。通过一种结合，“呈现和激发一种策略的理论侧重，强调特殊的（通常是被忽略了的）正义和不正义的空间”③。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作品中，用地缘政治美学的方法测绘当代文学艺术生产，绘制当代西方的文化地图。他指出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缺乏深度感的空间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④。后现代空间中，人身处其中，却“无觅其踪”，无法确定自身的位置，他指

① 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3 期，第 14－20 页。

② Barney Warf, Santa Arias: ㊊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1.

③ Barney Warf, Santa Arias: ㊊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2.

④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293 页。

出“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①]。人们身处后现代“超级空间”中，无法在空间布局中为自己定位，人的感官系统对周围的环境无法进行清晰认知与判断，人的身体与环境之间处于一种隔绝或断裂的状态，人的思维能力也无能为力。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以帮助人们定位自身，因为“空间——后现代的超空间——的这种最新变化最终成功地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②]。“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处古典时期的历史困境。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所产生的特定美学实践。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此要提出的空间概念，却能为大家带来一个切合我们历史境况以空间概念为基本根据的政治文化模式。下面让我把这个崭新的（假设的）文化形式暂且界定为一种‘认知图绘’式美学”[③]。阿尔伯特·托斯卡诺认为，认知图绘这一概念，詹姆逊强调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文化、政治和实践进行理论阐释的政治需求。认知图绘概念应该从个人与社会的“完美比例”这一理论假想进行思考。认知图绘理论可能使得个体和集体清晰认知和看清自身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处的方位和处境，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及地理上的分化与失衡现状，才可能规避个人与政治、经济、经验和抽象的脱节。认知图绘是詹姆逊在后现代语境下为地缘政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进行的理论预设，帝国时代的都市现代主义基本特征是经验和抽象的割裂与抽离，而这种割裂与抽离与“民族寓言”构成比照，因此阿迈德指责詹姆

①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97 页。

②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97 页。

③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515 页。

逊沦为民族主义美学之狭隘的工具论，阿尔伯特·托斯卡诺认为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去实现其反帝国主义、反种族歧视和反殖民主义殖民的斗争。[①]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一直以来现代与后现代的界限、分野、内涵、差异、阶段划分和艺术特征等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詹姆逊是后现代争论的一个重要代表，詹姆逊提出的认知图绘就是对后现代社会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和话语表述。认知图绘概念适用于后现代语境，尤其是当下的后现代转向，但是随着认知图绘概念的传播出现了话语泛滥现象。因此，凯尔纳强调必须对现代与后现代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厘清和界定，尤其要凸显当下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新鲜事物与过去传统的背离、断裂与颠覆，凯尔纳认为后现代话语应该为当前社会、文化与理论中所涌现的各种新事物与发展提供理论图绘和话语书写，尤其要强化和突出当下与过去、传统的发展、继承、背离与断裂。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开放性恰恰证明了当下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②]

（三）空间批评

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关注的焦点。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将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文学批评方法称为“空间批评”。菲利普·韦格纳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在其罗列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

① 阿尔伯特·托斯卡诺：《绝对的地图测绘，或，重返“认知图绘”》，《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2期，第44－50页。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知图绘与后现代的历险》，《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第73－90页。

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①] 空间不仅是一种产物，更是一种力量，“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②]。空间批评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布朗肖、巴什拉、布尔迪厄和美国的凯尔纳等著名理论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析。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向读者展示了空间的诗性体验境界，“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而所拥有的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③]。“巴什拉的幸福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具体的幸福，从存在的开始就与成为其象征的某些形象相联系。”[④] 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与结构》中，运用“场域”和“区隔”的空间概念，对现代小说的空间场域描写进行了艺术社会学解读。文学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空间，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学场”（literary field）的概念，文学空间（场）的生产本身也构成一个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这个空间（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背景”“环境”或“语境”，而是一个先锋与保守、政治与文学、资本与文学、统治与被

① 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 180.

② 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 189.

③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④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统治、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等各种权力因素共通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①]“场”的形成是不断斗争的过程，“它与象征资本一致，象征资本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以作家或以哲学家名义接受的价值，即法定的、几乎制度化的、否定权利的许可）积累下来的。就是以集体资本的名义，文化生产者感到有权利和义务忽视暂时权利的需要和要求，甚至以他们的原则和特有的标准和权力做斗争”[②]。凯尔纳在《媒体奇观》中，运用德波的“景观社会”思想和鲍德里亚的“仿真拟像”理论，探寻媒体景观所隐匿的文化意识形态秘密。以上这些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当代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所采取的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研究，拓展了传统学科的研究视域。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空间问题，空间问题进入理论研究层面。近年来，诸多国外空间理论的相关成果被系统译介引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从 2001 年至今，先后出版了《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三辑丛刊，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索亚等人的空间理论予以重点介绍；翻译出版了迈克·迪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2004）、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2005）、《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2006）、沙朗·佐京的《城市文化》（2006）等专著。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2003）、莫里斯·布朗肖的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学场及知识分子的功能》，包亚明译，《天涯》，1997 年第 2 期，第 39－42 页。

②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9 页。

《文学空间》(2003)、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2004)。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2003)、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2005)、戴维·哈维的《希望的空间》(2006)等一系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著作。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以及孙逊、杨剑龙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出版了五辑)；台湾学者夏铸九主编了以《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包亚明近年来一直关注空间问题，主编了一系列空间理论书籍，出版了《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等著作；胡大平翻译戴维·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和《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发表了哈维和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一系列论文；汪民安出版了《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2006)等。

国内关于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结构主义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例如，钱俊希从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出发，讨论后结构主义对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空间观上的影响，他认为后结构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对二元对立的结构进行解构，揭示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二是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先验和僵化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与再生产的。基于这两个基本特点，钱俊希对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的哲学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价，认为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后结构视角在空间科学之中的应用需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观之上。[①]

① 钱俊希：《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理论：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人文地理》，2013年第2期，第45－52页。